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 理论与现实问题

邢占军 主编

当代
社会主义
研究文存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 理论与现实问题

邢占军 主编

当代
社会主义
研究文存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 当代社会主义研究
文存 / 邢占军主编. — 济南 :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209-10748-8

I. ①和… II. ①邢…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
国—文集 IV. ①D6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5434号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文存
邢占军 主编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开 (170mm×240mm)
印 张 22.5
字 数 360千字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1月第1次
印 数 1-1000

ISBN 978-7-209-10748-8

定 价 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 第一章 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的动力分析 / 1
 - 一、走向和谐社会：时代发展的需要 / 2
 - 二、和谐社会：一个由来已久的难题 / 5
 - (一) 资本主义道德化：一个无解的命题 / 5
 - (二) 资本主义道德化遭遇的尴尬 / 9
 - (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全新的课题 / 14
 - 三、“和谐”社会的探寻：西方的启示 / 22
 - (一) 资本主义道德化的进程 / 24
 - (二) 资本主义道德化进程的动因分析 / 43
 - (三) 资本主义道德化进程和民主化进程的勾连关系 / 47
 - 四、和谐社会构建：当代中国的实践 / 56
 - (一) 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的动因分析 / 57
 - (二) 中国和谐社会构建动力的系统解释：中国共产党的修复力与转型力 / 65
 - 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三重面向 / 69

- 第二章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生活质量问题 / 73
 - 一、生活质量提升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重要意义 / 73
 - (一) 何为生活质量 / 74

- (二) 生活质量与和谐社会在理论上的一致性 / 76
- (三) 生活质量与和谐社会在实践上的一致性 / 82
- 二、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的客观生活质量 / 85
 - (一) 客观生活质量总体分析 / 87
 - (二) 客观生活质量五大领域具体分析 / 92
- 三、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的主观生活质量 / 101
 - (一) 主观生活质量的总体分析 / 102
 - (二) 主观生活质量具体指数分析 / 111
 - (三) 主观生活质量与客观生活质量偏离的分析 / 115
- 四、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生活质量的提升：公平的视角 / 120
 - (一) 公平的梳理与分析 / 120
 - (二) 公平是追求生活质量提升的动因 / 126
 - (三) 公平视角下提升生活质量的政策建议 / 128
- 五、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生活质量的提升：发展的视角 / 134
 - (一) 发展的梳理与分析 / 134
 - (二) 发展是实现生活质量提升的关键 / 137
 - (三) 发展视角下提升生活质量的政策建议 / 141

第三章 乡村和谐社会建设的机制 / 146

- 一、持续的社会流动机制 / 147
 - (一) 城乡互动的社会稳定机制 / 147
 - (二) 农民水平流动与城乡和谐 / 152
 - (三) 农民垂直流动与乡村和谐 / 157
- 二、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 / 160
 - (一) “有选举无合法性”的村治困境 / 161
 - (二) 乡镇政权的自我利益扩张与矫治 / 163
 - (三) 真正落实人大代表的“城乡同比” / 168
- 三、合理的社会保障机制 / 177
 - (一) 和谐语境下的“福利共识” / 178
 - (二) 社会权利发展的区域差异 / 181

- (三) 社会权利与其他权利的均衡发展 / 183
- 四、公正的冲突解决机制 / 185
 - (一) 农民组织与乡村冲突 / 186
 - (二) 农民权利的司法保障 / 191
- 第四章 收入差距、利益分化与和谐社会构建 / 197
 - 一、何谓公平? ——利益分化的理论探讨 / 198
 - (一) 古代思想中的分配正义: 传统中国的讨论 / 198
 - (二) 现代社会的分配正义: 概念与理论 / 202
 - (三) 马列主义的分配正义观: 共产主义 / 208
 - 二、是否公平? ——新中国的分配思想和制度分析 / 213
 - (一) 平均: 计划经济时代的分配思想与制度 / 213
 - (二) 效率与公平: 市场经济时代的分配思想与制度 / 218
 - (三) 现实之痛: 现阶段利益分化问题审视 / 227
 - 三、如何公平? ——对于现阶段利益分化问题的政策建议 / 236
 - (一) 短期目标: 调整不完善的分配制度 / 236
 - (二) 长期目标: 可行能力视角下的社区建设 / 246
 - 四、小结 / 263
- 第五章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干群矛盾及其化解 / 265
 - 一、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干群矛盾 / 265
 - (一) 干群矛盾: 社会复杂矛盾的汇聚点 / 266
 - (二) 干群关系的历史考察 / 269
 - (三) 干群关系的辩证视角 / 275
 - (四) 当前我国干群矛盾的基本特点 / 278
 - 二、发展战略的调整与干群矛盾的化解 / 282
 - (一) 发展战略与干群矛盾的内在逻辑 / 283
 - (二) 我国发展战略的变迁及其对干群关系的影响 / 288
 - (三) 化解干群矛盾的发展战略调整 / 297
 - 三、行政公正与干群矛盾的化解 / 302

- (一) 公平正义：首要的社会道德和价值 / 302
- (二) 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任务 / 309
- (三) 行政公正：化解干群矛盾的关键 / 312

四、创新社会管理与干群矛盾的化解 / 314

- (一) 社会管理困境对于干群关系的影响 / 316
- (二)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公共服务体系 / 318
- (三) 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完善矛盾化解机制 / 321

参考文献 / 327

后记 / 354

第一章 | 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的动力分析

恩格斯曾经提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印证了恩格斯这一结论的正确性。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市场的引入作为起点的，尽管引入市场的过程是艰难而又曲折的。“社会主义市场化”这一命题可谓是对中国从计划体系向市场体系转型的总结。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基于市场化逻辑而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开始对中国的国家治理发出严峻的挑战，从社会主义市场化到社会主义道德化的转型随之启动，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得以提出。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战略规划，“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和谐社会构建的主要内容。民主化（民主法治）和道德化（公平正义）成为和谐社会构建的两个最重要的着力点。市场化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鲜明的时代特征，更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前提和背景因素。因此，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出：社会主义市场化、道德化与民主化，构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重面向。

本章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入手，在考察西方社会民主化进程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3页。

与道德化进程相互关联的基础上，探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民主进程、市场进程和道德进程之间的勾连嵌入关系，并对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的动力和资源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力求为和谐社会构建中一些突出现实问题的研究提供一种理论分析框架。我们对和谐社会构建动力的探讨，将集中在道德化和民主化这两个关键因素的考察上。“道德化”更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被视为“和谐社会构建”的最重要变量。社会主义市场化、道德化与民主化这三重面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多少证明了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尚处在探索之中。

一、走向和谐社会：时代发展的需要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会自发地导致社会利益的扩大？换言之，自私自利的行为是否必然促进社会公益？对于这一问题，亚当·斯密的回答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发地驱动社会公益的呈现。早于亚当·斯密达半个多世纪的荷兰人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一书中也提出了与亚当·斯密几乎是同样的判断：私人恶德即公众利益。他在书中写道：

无数的人们在努力，
满足彼此之间的虚荣与欲望，
到处都充满邪恶，但整个社会却变成了天堂。
在这种情况下，
穷人们也过着好日子。^[2]

这是一幅多么和谐的社会景象！曼德维尔已经离我们远去达 270 多年了，斯密离开我们也有 220 年了。在人类社会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他们头脑中设想的和谐社会却没有实现。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富人的奢侈与穷人的困苦形成的鲜明对照。斯密所说的社会公益，更多的是表现为支撑和保障富人利益的一种功利性制度安排。即便是在今天，此种情形也没有多少改变。波兰尼在《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广泛流行的渗透经济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版，第 25—27 页；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钦北愚等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229—230 页。

[2] 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肖聿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 页。

(trickle-down economics) 教义——即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都会从增长中受益——得不到历史事实的支持。绝大多数社会都在自己的历史中演化出一些照顾穷人和弱势者 (the disadvantaged) 的办法。快速的转型破坏了旧有的应对机制和旧有的社会安全网,但在新的应对机制发展起来之前,它已经产生了这方面的需要。很不幸,来自 19 世纪的这个教训已经太经常地被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 ——它是自由主义正统的现代版——的鼓吹者遗忘了。〔1〕马克思早就看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已使它自己难以支配了,“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2〕。自从市场经济形成以来,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一直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但同时也伴随着危机、瘟疫和一时的毁灭状态〔3〕,这种状况与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和谐社会相去甚远。

在 20 世纪,西方中产阶级做生意获利的机会,在资本家活动的西方中心逐渐减少;而这些经济挫折对中产阶级的心理,正在发生压抑的影响。这个阶级对于工作的传统的热情,因私人企业范围的不受限制而被削弱。通货膨胀和赋税政策,使他们的孜孜为利和节衣缩食的传统美德变得毫无意义。〔4〕从 1962 年到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家庭财产最少的 20% 的家庭平均净值实际上在缩小,但是最富的 20% 的家庭平均净值却增加了 88%,而这 20% 中排在最前面的 0.5% 的家庭平均净值竟增加了 188%。到 1976 年,占美国人口 1% 的美国最富的人所拥有的财产占到国家总财富的 20%;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这 1% 的最有钱的人已经占有了 40% 的国家总财富。这一切对一个国家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至少,它埋下了使社会两极分化的种子。因此,美国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问题与它过去所面临的问题一样,仍是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代价之间的矛盾关系。〔5〕从 20 世纪末到现在发生的一系列的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资本家贪婪的本性所孕育出来的恶性结果。资本主义内在的反道德本性,使西方国家在一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促使西方人对“资本主义道德化”这一命题进行重新审视,而和谐恰恰处于这一命题的核心位置。

〔1〕 参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大转型》一书撰写的前言。参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刘阳、冯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7—278 页。

〔3〕 曹沛霖:《政府与市场》,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 页。

〔4〕 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09 页、第 414 页。

〔5〕 托马斯·麦克劳:《现代资本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72—378 页。

沿着同样的思路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在中国长达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历程中，邓小平讲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命题，验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促进经济总量的提升与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这种情形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已经成为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行，群体性事件的剧增说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社会和谐之间没有必然的正相关性。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与其弟弟邓垦的谈话中就已经指出：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间问题就出来了。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

因此，中国现在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在一个日益断裂的社会结构中，和谐社会如何构建？一个穷人难以享受到社会公益的国家能否释放出发展的动力？当极少数人掌控大多数财富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要在遵循斯密式的教诲中，渴望富人们在追求私利的过程中释放着他们本来无意追求的社会公益？所有这些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关系某一阶层、某一集团存亡的问题了，而是关系国家存亡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得以提出，而这一战略构想的提出又与中国所面对的二次转型密不可分。相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言，这一次转型乃是致力于克服市场化可能带来的道德缺失和社会断裂。如果说第一次转型致力于经济的发展进步，第二次转型则着重关注社会的和谐发展；如果说第一次转型解决的是资源配置机制之效率的问题，第二次转型解决的则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如果说第一次转型致力于如何实现“民富”，第二次转型则致力于如何保障“民生”。当然，第二次转型不是对第一次转型的否定。恰恰相反，第二次转型既是对第一次转型的补充，更是在政策和制度背景下推动第一次

〔1〕《邓小平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转型的深化。第一次转型孕育出了一个获取资源的时代，第二次转型孕育出了重新配置资源的时代，它们都为我国实现从社会主义市场化到社会主义道德化，再到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和谐社会：一个由来已久的难题

人类探索和谐社会的道路从很早便开始了。当一个社会的不和谐程度发展到几乎要将整个社会结构拖入崩溃的地步，统治者就会迫于压力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思想家们也会站在时代的前沿试图以自己的思想照亮未来的道路。从西周的礼乐制度到古希腊的城邦和谐思想，从秦末汉初的无为而治、与民生息到古罗马法制护民的实践，从唐朝的民贵君轻思想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天赋人权学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然而，对“和谐社会”这个难题所进行的系统而深入的实践，则是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的。资本主义道德化的过程，可以视为人类破解“和谐社会”这一难题的直接尝试。

对西方社会民主化进程与道德化进程及其勾连关系的考察，在本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西方国家的历史实践不仅能够为我们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国民主进程、市场进程和道德进程之间的勾连与嵌入关系提供有益的思路借鉴，也可以为我们构建相应的分析框架提供丰富的思想材料。而其中，对“资本主义道德化”这个核心概念的界定更是十分必要。为了对“资本主义道德化”这个概念进行更加清晰的界定和说明，在本章中我们首先从本质上对其予以阐释，指明资本主义道德化因其自身的野蛮性本质而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然后，我们对资本主义道德化的具体作用给予界定，指出其不过是资产阶级为了防止社会濒临崩溃而进行的补救性措施。资本主义道德化并非目的，而仅仅是手段。

（一）资本主义道德化：一个无解的命题

资本主义的野蛮化是其本质特征，这使得所谓的资本主义道德化成为一个无解的命题，而资本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想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市场自身追求效率，并不必然带来道德化，而资本主义依靠市场追求利润的本性显然也无法实现道德化。对于资本主义的野蛮性，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论述。透过这些论述不难发现，资本主义野蛮性主要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首先，原始积累充满血腥而非勤劳致富。以伍德、米勒和布伦科特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资本主义是道德和正义的。他们的主要论点是：道德的善在于正义和权利，而正义内在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只要与特定的生产方式相一致、相适应的交换和制度就是正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与特定生产方式相一致，因此是正义的。^[1]这种观点将道德和正义仅仅定义为一种符合某种生产方式和制度的状态，显然没有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的野蛮性。姑且不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制度安排道德与否，就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形成的过程而言，其本身就充满了野蛮的掠夺、奴役、盗窃和侵略，表明其制度道德性的可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原始积累对劳动者的剥夺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历史的”“资本主义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马克思用大量的笔墨描述了大批城市里的学徒、侍从和农民是如何被封建者用绞架、耻辱柱和鞭子强制驱离土地而成为无产者的。^[3]

剥削理论研究的大师罗默在这一点上的论述也十分深刻。他从起源的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和非道德性，并且将导致资本主义剥削不公正的根源归结为生产资料的初始分配不平等。他指出：由于工人生产剩余产品是一系列市场交易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又源于最初不平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那只能是因为导致剥削产生的生产资料的初始分配是不公正的；并且，这种不公正经过代代相传可以积累为巨大的不平等。^[4]罗默还对新自由主义辩士将资本的不平等归因于时间效率差异、冒险倾向的强弱、企业家能力的不同等符合道德因素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指出起初的不平等是由社会建构的，起源于之前不平等和压迫的历史：不同所有权的初始条件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通过盗窃和野蛮强力的作用确立的。较之而言，天赋、企业家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不过是对之前不平等历史的反映。^[5]与之呼应，另一位著名学者柯亨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非正义的观点是基于一组历史上不具逻辑必

[1] 曹玉涛：《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论述评》，《哲学动态》2008年第4期，第41—42页。

[2] 《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3页、第829页。

[3] 晏辉：《资本原始积累的伦理批判》，《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3期，第1—4页。

[4] 朱菊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不公正起源的探讨》，《求索》2011年第5期，第108页。

[5] 段志桥：《约翰·罗默的非劳动价值剥削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3期，第103—104页。

然性的环境，即基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以不道德的方式进行的这一事实。”〔1〕从根本上讲，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根源的非道德性，绝不可能为这个制度的道德性做辩护。

其次，自由竞争的市场本身常常引发非道德性的行为。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市场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市场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资本化，而资本化的实现过程就是原始积累这一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2〕而这种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资本家手中，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现象严重。可以说，资本主义市场化形成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作为权利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正如胡萨米所言，完全根植于市场和资本利益的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将劳动力市场化，必然结果就是剥削，在表面的平等下导致实际的不平等。〔3〕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竞争，而它的动力就是利己主义。市场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是优胜劣汰，带来的又是“作为结果的不平等”。随着生产力和技术的进步，劳动者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数据显示：扣除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因素，在资本收入不断扩大的同时，劳动者的实际工资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下降。过去的20年中，只有最上层1/5的职工获得了实际工资的增长。如果把收入分配分为五个层次，越往下，工资收入下降得越多，第四层下降为10%，最底层则下降为23%……目前，美国最富的1%的人拥有全美家庭财富的40%，比90%的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还要多。在英国，最富的20%的人所占有的财富，是最穷的20%的人所占有财富的10倍。〔4〕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就是：就单纯的自由竞争而言，导致的结果便是马克思所谓的“人的异化”。由于自由竞争的逻辑就是追求资本的增值，如此就将物质生产本身当成了目的，人反而成了物质生产的手段，甚至成了手段的手段。劳动者更是成了作为物质生产手段的机器的附庸。于是，人成了异化的人，人的劳动成为异化劳动。〔5〕英国著名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托尼在其经典著作《贫

〔1〕 段志桥：《社会主义及其未来：约翰·罗默访谈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第70—7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1页。

〔3〕 曹玉涛：《“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论述评》，《哲学动态》2008年第4期，第42页。

〔4〕 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周晓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9页。

〔5〕 何怀远：《“生产主义批判的”的历史逻辑》，《哲学动态》2006年第1期，第27页。

婪的社会》中，也对资本主义这种市场特征做了深入的批判。在书中他批评亚当·斯密等人对贪婪的纵容。他指出，如果把本来健康的经济效率由手段提高到目的本身，那么财富服务于人的福利的意义就丧失了。其结果便是对底层人民的漠视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使社会成为可怕的图画。^[1]显而易见，当资本增值、物质生产和效率成为目的时，自然的结果便是社会平等和社会道德在自由市场中没有丝毫的地位，整个社会背离道德的准则，显示出野蛮化倾向。包括阿格尔在内的相当多学者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可见，如果一个社会沿着市场化的逻辑永久地运转下去，无疑是割喉式的自杀。当一个社会无法消融因为市场化而产生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分裂时，最终结果不是穷人的死亡，而是社会整体性的毁灭。

再次，资本与权力结盟带来了等级体系。现代国家建立之后，国家权力与资本的联盟成为野蛮资本主义的又一表现形式。政府依赖资本，资本绑架政府，在现代社会成为一种通例。众所周知，裙带资本主义是亚洲许多国家经济增长困难的制度性障碍。然而已有研究成果表明，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并不单单是亚洲的产品，它与美国人也并不遥远，以致于有人讽刺说，在美国政治精英并不热心公益，他们照旧让利于他们喜欢的专攻石油问题的院外游说者，或者副总统本人（意指当时的副总统切尼）最喜欢的建筑公司。^[2]美国的裙带资本主义不仅产生腐败、寻租等政治灾难，更是带来市场灾难：破坏市场秩序，使民众受到更大损害。有学者认为，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相当程度上起因于裙带资本主义。由于私人资本与政府的结合，使得房地美、房利美等享受巨大特权的公司，利用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为了一己私利在相当大程度上操作美联储，从而引发巨大经济灾难。^[3]权力—资本联盟比单纯的资本家追求私利的市场化运动更加野蛮，其最终结果便是产生了以公共权力作为保护伞的资本家和服务于资本家的政府官员。如此，就导致了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局面，少数人的富贵与奢侈是以多数人的辛勤劳作为前提的。这样的结果必将使社会陷入整体性的毁灭。

资本家不仅仅通过政治谋取私利，还通过知识占有、媒体宣传等方式进行思

[1] 彭小瑜：《“经济利益不是生活的全部”：理查德·亨利·托尼的资本主义批判》，《史学集刊》2011年第4期，第7页、第12页。

[2] 克里斯蒂安·阿斯贝格：《“资本主义道德化”问题初探：民主实验主义和规范共同演化现象》，张大川译，《国际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23页。

[3] 张鑫：《从次贷危机看裙带资本主义》，《文汇报》，2008年12月10日。

想控制，以达到维护资本权益的目的。阿格尔曾指出：在资本主义技术统治阶段，早期市场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合法性已经被科技统治的合法性所取代。公民把所有控制社会的权威都让给了管理精英，从而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危害。当权力日益转向那些被认为是能带领人们摆脱经济危机的技术精英时，这些权力精英便极力使自己与大众保持距离，以便更好地充当复杂社会系统的操纵者。这样，对资本的垄断与对信息和对话机会的垄断就结合在一起。^{〔1〕}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原始积累引发的制度原罪性^{〔2〕}，单纯市场和竞争引发的诸多非道德性的行为，加之资本与政治必然联合引发的等级体系，使得整个制度从根本上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资本、利润成为顶礼膜拜的偶像，人的需要被严重抹杀，社会结构日益撕裂，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社会和谐更是难以从根本上得以实现。因此，纯粹放任的市场经济引发的道德灾难，加上必然导致的资本家把持政府的现实，使得资本主义本身无法产生道德的结果。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道德化成为了一个无解的命题，和谐社会更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

（二）资本主义道德化遭遇的尴尬

相对于资本主义野蛮化，资本主义道德化这一命题显得异常复杂且扑朔迷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依靠貌似完美的语言系统对其进行了无数的辩护与修饰，从而导致了理论上的迷乱与模糊。资本主义道德化的核心内容是私利与公益的关系问题，或者说，资本主义的一些非道德因素能否被更加道德的资本主义所修正^{〔3〕}，这一命题至少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自由市场制度的道德化，二是企业家行为和公司行为的道德化，三是监管力量的道德化。

相对于其他两个层面来说，自由市场制度的道德化显得最为扑朔迷离。斯密显然是系统阐述这一命题的鼻祖。在斯密看来，自由交易是保障相互利益的一种手段，遵守公平游戏规则，受到公正的观察者赞许，它就是道德的。关键要看交

〔1〕 申治安、王平：《阿格尔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多维度批判》，《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第93页。

〔2〕 《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1页。

〔3〕 帕特里克·法罗：《竞争的伦理》，李存山译，《国际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33—35页。

易条件是否平等，从而使任何交易者在规则合理游戏中不强迫他人或进行欺骗，以追求财富。自由、互惠以及遵守共同规则的平等交换，这些因素确保交易自由的体制具有合法性。^[1]赫伯特·斯宾塞则倾向于从固有的“生存竞争”中寻求道德意义，因为“生存竞争”被假定为人类进化所必需的，它提供了一种自由的、负责任的社会生活模式。反对遗传进化模式、奉行文化进化模式的哈耶克把基本的道德归因于个人的自发的竞争，竞争将使每个社群自发地而非刻意地出现正当行为的规则，并使有利的行为规则得以发展。依此而论，竞争就是基本的善行和理性，因为它要求人们为了生存而理性地行动，它可以通过广义的契约而达到一种有利于多数人的社会规则。^[2]诸如此类的论断不胜枚举，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资本主义野蛮性的最美丽的辩护。流行于西方世界的院外集团、利益圈子不都是在试图以危害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普遍规则来增加私利吗？有那么多的公司通过隐瞒账目、滥用基金和内部交易来获取私利，这如何解释呢？如果在竞争过程中力量不平等，对竞争规则的遵守将直接有利于那些掌握最多资源的人，对此又怎么解释呢？

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引发了对资本主义道德化的思考。韦伯所开创的依靠宗教对资本主义注入道德灵魂的做法显然已经落伍了。在韦伯那里，获利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伦理义务，正是这种观点为新企业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伦理基础和正当理由。^[3]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实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正因为如此，修道士放弃现世的义务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责任。^[4]在韦伯看来，不懈地劳动不仅仅是一种消极的善，也是上帝所规定的每个人借以证实自己的生活方式。利息和财富只有在导致懒散和浪费时才在道德上有害。只要它们是履行职责的结果，就应受到推崇。人不应拒绝接受上帝的礼品和成为他的管家：“你应为了上帝而非为了肉体 and 罪孽而劳动致富。”因此，只有不懈地努力和没有不良嗜好，干实业的人便有义务去成功地谋利。^[5]

[1] 皮埃尔·得缪勒那埃尔：《经济行为与资本主义的规范》，秦喜清译，《国际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14页。

[2] 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周晓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9页。

[3]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5页。

[4]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9页。

[5] 莱茵哈特·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肖像》，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